

## 《学报》为我“作嫁衣裳”

张可荣

在阅读世界里,书或文章的作者永远是读者眼中的关键信息,文章的编辑呢?编辑永远是幕后英雄。回顾自己几十年来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的关系,以及《学报》编辑同志们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多话要说,归根到底可以用一句话表达:感谢学报编辑为我“作嫁衣裳”!

《学报》是我科研工作真正起步的地方。1992年第1期和第3期,《学报》相继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述略》和《毛泽东论开明绅士》。从此开始,我所写的真正算得上论文的文章,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在《学报》上刊发的,算起来几乎每年1篇;我研究心得比较多的领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其中近20篇论文的三分之二是在《学报》上发表的。可以说,没有《学报》几代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就不会有我的学术进步。

先说1992年前与《学报》编辑接触的一个片段吧。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经分配来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86年《学报》创刊。这个时候的我,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科研、什么是学术成果,更不知道怎么搞科研,只知道搞科研要写文章,而写文章的劲头从大学读书开始就比较足,手头也有文章。于是,就把一篇《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交到了创刊组建

不久的《学报》编辑部。一段时间后,大约是1986年年底,编辑把稿子退给了我。退稿的事我记得清楚,退稿的理由,我隐约还记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的稿子不是学术论文,二是说我还要学会写文章。这不算“打击”,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试一试。读书人都有过被退稿的经历。现在想起来,面对退稿,真正让人郁闷的是不知道真实理由,但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不多见的,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个时期一些刊物编辑的退稿信,退稿信往往直击文章的关键缺陷并提出修改的方法路径。

这次《学报》退稿后,我不再做无用功去麻烦学校学报编辑或者其他高校学报编辑,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写短文练笔上,开始把投稿的主要方向放到发短文的刊物上。这一改变持续了6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投稿和发稿的刊物主要是《历史大观园》(中山大学主办,后来停刊)《博览群书》《文史杂志》和《湖南党史月刊》等通俗刊物上。从1987年至1992年,我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涉及文史、党史和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发表在《历史大观园》1991年第6期上的《李鼎铭还是一位有名中医》,在《人民日报》1991年6月23日的《每周文摘》版上摘登。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今天忆起这些,感觉到当初《学报》编辑的退稿指

点是很重要的,他让我从基本功练起,下功夫练习写文章,积累经验,同时也阅读了不少书籍,逐渐明确了研究领域和方向,为写长文(学术文章)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92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向《学报》投稿,每年都会得到编辑们的指导。为什么与《学报》结缘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这跟哪些具体的事情和人物有关?我没有了印象。想来想去,有一个理由是成立的,就是学校和《学报》对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主动关心和提携。我还记得一件事,正是在1992年前后,学校为鼓励青年教师搞科研,拿出专项经费予以资助,我获得了1000元的经费资助(竟然未用完,退给了学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学校重视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取向。自1992年至今,在我的印象里,《学报》李传书教授、刘范弟教授、王新生教授、陈浩凯教授等,都曾给予过我极大地帮助,特别是他们对我的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有些情景至今难忘!久远的事情总是有些模糊,就说最近十多年发生的几件事吧。

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带着论文《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的初稿,向《学报》编辑刘范弟教授请教其中的一则史料问题。这则史料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对中华文化数千年演变历史的一段中肯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段话很有名,也被广泛引用,因此,我也想在文章中引用。可是,因为藏书和阅读所限,我没有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著作,也没有在其他文章中看到原始出处,只能转引。刘范弟教授听我这么说,随即告诉我,他不仅读过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也很了解这位著名学者,能够找到文献出处。不久,问题就解决。这段话

是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说的,文章收录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之中。刘范弟教授不仅把原文发给了我,而且亲自对我文章的注释进行了改正。这则插曲,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还记得他当时从电脑文献库中帮我找寻史料时眯起眼睛、聚精会神的样子。有一天,刘范弟教授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他是不大愿意串门的,退休之前连手机都不愿意使用,同时他又是我的兄长辈。他找上门来,与我要写的论文有关。我曾告诉他写关于“近代以来中医存废问题”和“新中国30年评价问题”方面的文章,希望他指点指点。未想到,他真的就是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并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当时,我在学校工会工作,事情比较多,只能忙里偷闲思考这两个问题。很多年后,才写出相关论文,其中1篇就是在《学报》发表的。

说起主编王新生教授,他年龄比我小许多,但学问比我做得好,他接受过博士研究生的专门训练,做事做研究都非常有毅力,也非常乐于助人。我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选题,就得到过他的指导。我是2007年左右开始把这个选题纳入学习和研究视野的,并坚持到今天。2018年我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小结。记得2009年在写《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一文时,材料积累了不少,但是没有多少思想,也总是理不清思路。我把草稿给他,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他看过后不仅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还介绍我阅读法学家冯象所著的《木腿正义》一书,说书中关于“词汇”与“观念”关系的论述对我的研究有借鉴意义。我找来《木腿正义》,原来书作者冯象是华东师大著名学者冯契先生的儿子,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应

该听过冯契先生的讲座。而书中关于“词汇”与“观念”的关系论述正是我要首先搞清楚的。冯象在书中表达的大致意思是:语词的历史不等于观念的历史,一个词在今天的用法和它在古汉语或用它转译的某些外国术语的原意,可能有差异,语词的外壳(文字记载)与它所负载的观念之间,也未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王新生教授的点拨和冯象观点的启发,我进一步修改了论文。文章在《学报》2010年第5期发表后,还引起了一定反响。后来,王新生教授离开了《学报》,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陈浩凯教授又是怎么为我“作嫁衣裳”的呢?说来话长,从时间上看已超过了10年!这里,只说一说最近的几件事。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重要论断以来,我就想对五四时期的“偏激言辞”做点研究。我觉得,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一些“偏激言辞”并不等于文化自卑,他们也非常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为什么会说出一些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呢?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当时我正在刘解龙教授的邀约下,协助撰写有关道路自信的部分章节,关于“偏激言辞”的文章就一直没有写成。2016年底,在陈浩凯教授的催促下,我把初稿交给他指导,题目叫《试论五四时期的“偏激言辞”》。不久,陈浩凯教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论文题目显得大而化之,主题不突出,

要改;二是文章思路结构也要作出相应调整。意见提得好,给我很大启发,回看文章初稿,的确存在这样的缺陷。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修改论文题目。几天之后,他告诉我,题目可以改为《偏激言辞:五四思潮的论战策略》。用“论战策略”分析“偏激言辞”是我的文章的主要观点,但我没有明确地提出来。陈浩凯教授等于给我贡献了一个思路。文章最后发表在《学报》2017年第6期上。在此前后,我写的一些关于“中国梦”的文章也都从陈浩凯教授那里得到过帮助。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树立大历史观”“树立正确党史观”等论断受到学界关注。陈浩凯教授跟我说:“你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应该思考这些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也有利于党史学习教育。”正是在他的提醒和帮助下,我撰写了《学好党史必修课需要大历史观》一文,并为他主笔撰写有关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文章提供了一些材料和想法。

我在这里记录下这些点点滴滴,并非是要刻意恭维帮助过我的编辑同志。我想,与《学报》有关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当事人的我不说,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说出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又想,有关“历史”的东西为什么总是令人着迷?因为人们记录和认识过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从历史的细节中不断得到启示的过程。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